

丹东蒙古族志

丹东市民族事务委员会
民族志编纂委员会 编



丹东蒙古族志

丹东市民族事务委员会
民族志编纂委员会 编



辽宁民族出版社

© 丹东市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志编纂委员会 200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丹东蒙古族志 / 丹东市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志编纂委员会编. —沈阳: 辽宁民族出版社, 2009.7

ISBN 978-7-80722-834-9

I. 丹… II. 丹… III. 蒙古族—民族志—丹东市 IV.
K28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21459 号

出版发行者: 辽宁民族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印 刷 者: 沈阳市第三印刷厂

幅 面 尺 寸: 145mm × 210mm

印 张: 9

字 数: 200 千字

插 页: 12

印 数: 1-1000

出 版 时 间: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刷 时 间: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责 任 编 辑: 朱 虹

封 面 设 计: 杜 江

责 任 校 对: 天 华

定 价: 30.00 元

联 系 电 话: 024-23284345

邮 购 热 线: 024-23284335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调换

丹东市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志编纂委员会

主任：顾军

副主任：杨魁章、白国华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车文爱 王宝义 尹海岩 包文昌

白国华 刘歧 杨魁章 顾军

魏纪有

《丹东蒙古族志》编委会

名誉主编：陈福 于一贫

主编：燕声东 包泉万

副主编：车文爱 姜涛

编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车文爱 包泉万 孙守涛 李菲

姜涛 靳云田 燕声东

凡例

一、指导思想。《丹东蒙古族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突出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全面真实地记述丹东地区蒙古族的自然和社会的历史和现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运动的记述，以中国共产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

二、体例与结构。本志书采用新志体例：全书由序言、凡例、概述、志、传、图、表、录等组成，以志为主，其他为辅，共计 15 章。以时系事，横排竖写。照片在前，图、表穿插于各章之中。

三、断限。本志书的上限为康熙二十六年（1687 年），蒙古八旗进驻丹东地区始，适当上溯；下限止于 2005 年。并依据“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编纂原则，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丹东蒙古族的自然和社会状况。

四、地域范围。1876 年，自丹东始设县制以后，行政区划多有变化，且市名也有变更。原则上依据不同时期的行政区划界定。一般泛指时称丹东地区。岫岩满族自治县划归鞍山，1992 年后不再记述；大堡蒙古族乡时称蒙古族镇，按国家现行要求，一律规范为大堡蒙古族乡。

五、人物收录。本志书所记人物，以生地在丹东地区为主，适当收录曾在丹东工作，有一定影响的社会人物；坚持生不立传的

原则，在世人物以事系人入志，凡不能立传和简介者，均列图表。

六、数据。本志书涉及的人口数据，新中国成立前的均采用史料记载数据，新中国成立后的数据为全国人口普查统计资料。

七、纪年。清代至民国采用朝代年号和民国纪年，并括注公元纪年。1945年9月3日至新中国成立前可直接使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采用公元纪年。

八、其他有关要求，均按《丹东市志书编写规约》执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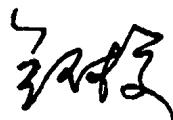
序 言

丹东地处辽东半岛东南部，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边境城市。在这块充满着生机与活力的土地上，居住着 36 个民族。其中，近 3 万人口的蒙古族以勤劳朴素、勇敢顽强而著称，是丹东第二大少数民族。早在蒙元时期，丹东就有了蒙古族先民的足迹。公元 1687 年后，大批蒙古族官兵陆续进驻岫岩、凤城等地，奉命戍边。从此，蒙古族便在丹东定居，繁衍生息。三个多世纪以来，丹东的蒙古族同其他兄弟民族一道，为开发、建设和保卫祖国边疆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为丹东的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书写了本民族光辉灿烂的历史篇章。

《丹东蒙古族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丹东蒙古族的过去和现在，反映了丹东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该书从不同角度记述了丹东蒙古族的历史和文化源流、经济社会事业、风俗民情、著名人物和重要历史事件等，较为全面地展现了丹东蒙古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概况。同时，也展现出丹东民族工作取得的巨大成就，折射出丹东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繁荣的历史。这是一部生动的爱国主义教材，也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地方少数民族史料。

《丹东蒙古族志》资料翔实，特点突出，尊重历史，反映现实，是一部具有地方性、民族性、资料性的好志书。该书的出版，不仅填补了丹东蒙古族没有志书的空白，也为进一步研究丹东蒙古族提供了重要资料。该志书作为丹东地区的第四本民

族志书，将对弘扬民族文化，增进民族间的相互了解，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丹东市民族事务委员会以及参加编志工作的所有人员，为促进少数民族事业发展做了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办了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好事。在此，让我们为《丹东蒙古族志》的问世表示热烈的祝贺，向为此付出辛勤劳动的修志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2009年11月

目 录

序 言	包玉梅
凡 例	1
第一章 概述	1
第二章 族源与姓氏	4
第一节 族源	4
一、族称	4
二、来源	6
第二节 姓氏	14
第三章 人口分布及其构成	20
第四章 政治	26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前蒙古族的政治生活	26
第二节 建国后蒙古族的政治生活	32
第五章 经济	40
第一节 综述	40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前的蒙古族经济	41
第三节 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的蒙古族经济	43
一、组织起来，走农村合作化道路	44
二、人民公社化中蒙古族农民的生产和生活	46
第四节 “文革”期间的蒙古族经济	50
第五节 改革开放后的蒙古族经济	52
一、粮食产业	53

二、工商产业	57
三、林果产业	61
四、养殖产业	65
五、柞蚕产业	69
六、烟草产业	72
七、瓜菜产业	74
八、农田水利建设	77
第六章 民族乡与蒙古族聚居村	81
第一节 大堡蒙古族乡	81
第二节 蒙古族聚居村	84
一、三官村	84
二、爱路村	86
三、大榆树村	87
四、何家岗村	88
五、广胜村	89
第七章 社会事业	91
第一节 文化	91
第二节 教育	99
一、清朝时期的蒙古族教育	99
二、民国时期的蒙古族教育	102
三、日伪统治时期的蒙古族教育	106
四、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的蒙古族教育	107
五、“文革”期间的蒙古族教育	112
六、改革开放以后的蒙古族教育	113
第三节 体育	126
一、蒙古族传统体育	127
二、蒙古族体育开展情况	132

第四节 卫生	137
一、传统的蒙医蒙药	137
二、卫生事业的发展	141
第五节 科技	149
第八章 语言文字	157
第九章 文学艺术	161
第一节 传统的蒙古族文学艺术	161
一、民间歌谣	161
二、说唱文学	163
三、谚语与格言	165
四、工艺美术	167
第二节 蒙古族文学艺术在丹东的传承和发展	168
一、蒙古族民间文学	168
二、蒙古族文学艺术人士	172
第十章 风俗习惯与宗教信仰	178
第一节 居室宅院	178
第二节 服饰	180
第三节 饮食	182
第四节 婚姻	184
第五节 育儿	187
第六节 节庆	188
第七节 宗教信仰与祭祀	191
第八节 丧葬	198
第九节 礼仪与禁忌	199
第十一章 文物古迹	203
第一节 婆娑府遗址	204
第二节 忽必烈塔	206

第三节 元代斜列站印	208
第四节 秦家大院	209
第十二章 家谱	211
第十三章 人物	222
第一节 传略	222
第二节 人物简介	229
第三节 人物表	250
一、党代会代表	250
二、人大代表	252
三、政协委员	253
四、党政干部	254
五、科技人员	254
六、劳动模范、“五一”奖章获得者、“三八”红旗手	255
七、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256
第十四章 大事记	257
第十五章 附录	260
修志始末	275

第一章

概 述

在浩瀚的黄海之滨，在美丽的鸭绿江畔，在祖国 2.2 万公里边境线的东端起点，屹立着一座城市，她就是全国最大的边境城市——丹东。

丹东市既古老又年轻。说她古老，是依据考古发现的丹东“前阳”人头盖骨化石表明，早在 1.8 万年前的原始社会，丹东地区就有人类的祖先在此生息和繁衍；说她年轻，则是因为城市的发展史不长，丹东在清光绪二年（1876 年）设县治，1934 年日伪统治时期，丹东成为伪安东省的所在地，1937 年正式设市，遂成为丹东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丹东是个多民族的聚居区，在丹东 15 222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聚居着汉、满、蒙古、回、朝鲜、锡伯等 36 个民族，总人口 240 多万。在少数民族中，以满族人为最多，人口 80 多万，被称为全国最大的满族聚居区。蒙古族有 2.7 万人，是丹东地区第二大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凤城和岫岩一带。有 1 个蒙古族乡，即凤城大堡蒙古族乡，5 个聚居村，即凤城大堡乡三官村、爱路村，宽甸杨木川镇大榆树村，东港合隆满族乡何家岗村，凤城蓝旗镇广胜村，构成了“小聚居、大分散”和“城市少、农村多”的基本格局。

丹东地区的蒙古族基本属于外迁民族，据初步调查，丹东地区的蒙古族除少量有蒙古族先民鲜卑和蒙元时期留居的后裔外，大部分是清朝康熙二十年（1681 年）开始，为保护其“龙兴重

地”而陆续调拨辽东驻防的蒙古八旗官兵和巴尔虎部的后代。他们在迁居丹东的300多年中，同其他兄弟民族一道，为保卫、开发和建设新丹东作出了重大贡献。

丹东地区的蒙古族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书写着壮丽的历史篇章。在辛亥革命时期，丹东地区的蒙古族人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曾经以宏大的阵容奋战在辛亥革命的前列，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著名的反清义士鲍化南。辛亥革命前，鲍化南担任凤城鸡冠山乡联庄会的会首。他作为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会员，在同盟会辽东支部的领导下，组织领导了辽东地区的武装起义。1911年10月10日，武昌和广州同时举行武装起义，辛亥革命爆发。不久，鲍化南也在辽东举起了“推翻帝制，实现共和”的义旗，与广州起义遥相呼应，南北夹攻清王朝。此后，东北各地起义军经过整编，编成关外民军一军二师四旅，鲍化南被任命为旅长。他南征北战，在辛亥革命的光辉史册上写下了不朽的一页。

在抗日战争时期，丹东地区的蒙古族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涌现出鲍庚武、包乾、包镇等一批抗日将士，他们在祖国各地英勇地抗击日寇，浴血奋战，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英雄的丹东蒙古族儿女，为全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解放战争中，丹东蒙古族的优秀儿女卜凤刚在著名的塔山阻击战中，三次负伤不下火线，只身闯入敌指挥部，俘敌100多名，荣获特等功，被授予“孤胆英雄”称号和最高荣誉——“毛泽东奖章”，成为全体蒙古族的骄傲。

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丹东地区的蒙古族在各条战线上，为建设强大的祖国和美好的家园勤奋工作，涌现了一批批卓有声誉的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如教育战线上被誉为“人

民好校长”的包全杰，科技战线上被称为“玉米培育专家”的何晶等等，以他们为代表的丹东蒙古族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而无私地贡献着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全部力量。

蒙古族是一个勤劳、勇敢、剽悍、豪放的民族，以能骑善射、能歌善舞著称于世界民族之林，有“马背民族”之美喻。他们祖辈辈在蒙古高原上“逐水草而居、以牛羊为伴”，长期的游牧生活铸就了蒙古族人坚韧不拔、勇于进取的民族精神。丹东地区的蒙古族为戍守边关，以军屯和民屯的形式大批迁居辽东地区后，正是依靠这种民族精神，完成了由传统游牧经济向农耕经济的历史性转变，为推进丹东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蒙古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民族。据专家考证，早在 8000 年前，蒙古族就已形成，蒙古人种被世界人类学界确定为人类三大人种之一。有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字，也有本民族的风俗习惯。迁居丹东地区以后，由于同汉、满等民族长期杂居，先是用满语、满文，渐纳满族的习俗。以后同满族一道逐步用汉语、汉文，并与满、汉通婚，也接受了汉族的风俗。如今丹东地区的蒙古族懂蒙古语、识蒙古文的寥寥无几，民族语言和文字基本丢失。风俗习惯除婚丧嫁娶等有些与汉族和满族不同外，其他习俗没有明显差异。

历史上，丹东地区的蒙古族为开发丹东，建设丹东，保卫丹东作出过重大贡献。如今他们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与各兄弟民族一道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作出更大的贡献。

第二章 | 族源与姓氏

第一节 族 源

一、族称

蒙古族属于东胡族系。来源于唐代的蒙兀室韦，最初的游牧地区是现在的额尔古纳河流域，公元9世纪西迁至蒙古高原漠北的肯特山一带。

早在战国和秦汉时期，生活繁衍在蒙古高原广大地区的民族通称为“胡”，胡人中除匈奴有明确称谓之外，还有一个东胡，因其驻牧之地在匈奴之东，故称东胡。西汉初年。东胡被匈奴击溃，逃往乌桓山（今内蒙古赤峰一带）的一支后来称为乌桓族；逃往鲜卑山（今内蒙古通辽一带）的一支称为鲜卑族。鲜卑族在东汉末年分化出宇文部、慕容部、拓跋部等。东晋时期，鲜卑慕容部的一支吐谷浑曾居住在辽东地区。突厥是公元6世纪兴起于蒙古高原的，史称“匈奴之别种”（《周书》卷五十），突厥族建立的政权，于公元8世纪被回纥灭掉。《新唐书》称“回纥，其先匈奴也”。蒙元以后，称畏兀儿，后来发展形成今天的维吾尔族。南北朝时期的“柔然”，《魏书》称“蠕蠕”，乃“东胡之苗裔”，自称先世源于北魏的拓跋氏。辽代的契丹族属东胡族系，

为鲜卑的一支。

《旧唐书》所载“蒙兀室韦”中的“蒙兀”就是最早的“蒙古”一词的汉文音译。“室韦”则是“鲜卑”的音转和别写。突厥文的《厥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中所称的“三十姓鞑靼”和“九姓鞑靼”，都是“室韦”诸部，其中，蒙兀部的首领铁木真，于1206年统一了蒙古高原漠南和漠北诸部，建立了蒙古汗国，铁木真被尊为成吉思汗。1271年，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统一中原，建立了大一统的元朝。

“蒙兀室韦”作为一个具有共同的地域、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化和共同的心理素质，以及共同经济生活的民族共同体，当形成于成吉思汗时代。长城以北的广袤地区，生息繁衍的族群，由于流动性很大，在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历史时期均有不同的称谓、不同的表述，其族源有广泛的共同性。至今我国北方的诸多少数民族，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文化方面依稀尚存的共性，就是这种民族性的遗存和共同族源的明证。

这些在漫长的历史时期源于共同的族系而有不同称谓的族群，最早可以追溯到夏商时期。《史记·匈奴传》云：“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司马迁所谓“夏后氏”，为胡奴的先祖；胡奴就是胡奴蒙古人。宋人罗泌说“夏”又号称“莘粥”（音：熏遇）；周朝时称为“猃狁”（音：险允）；秦时称为“匈奴”。因而，《史记》又说：“匈奴，其先祖……猃狁，居于北蛮。”猃狁又称猃狁蒙古，亦即后来的“狄蒙古”和“胡奴蒙古”；东胡就是“胡奴蒙古”的一支。汉初亦为（匈奴）冒顿（单于）所破，远窜辽东塞外（《汉书·鲜卑传》）。汉灵帝初年，在辽东有建制，《通典》云：“辽东苏仆延，众千余落，自称峭王。”所以，史书都说“乌桓者，本东胡也。鲜卑者，亦东胡之支也”，“亦东胡之余也”（见《通典》《三国志·魏志》和《魏